

共和国第一冤案

狂人自白

张重天

华艺出版社



共和国第一冤案

张重天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经销

杭州新华外文科技印刷厂印刷

※

787×1092毫米1/32开本印张：10.75 字数220千字

1989年8月第一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7-80039-282-7/I·B3

印数：1—50,000册 定价：4.30元

序

王 芳

一九五五年，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，这就是所谓“潘汉年、扬帆反革命集团案”。这起由反革命两面派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大冤案，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平反昭雪。而对于这次冤案的内情，对于潘汉年、扬帆其人其事，则至今仍然鲜为人知。南京军区作家张重天同志写的《《共和国第一冤案》（亦名“狂人自白”）》一书，以扬帆同志的经历为主线，反映了“潘、扬事件”的始末，是一本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好书。

扬帆原名石蕴华，又名殷扬，江苏常熟人，一九三七年入党，长期从事革命保卫工作。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，他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、局长。在鱼龙混杂的“十里洋场”，率领公安干警日日夜夜战斗在黄浦江畔，查获了国民党潜逃前夕潜伏下来的特务电台，捕获了一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，逮捕了台湾派来行刺陈毅市长的特务刘全得，镇压了一批罪孽深重的恶霸、地痞、反革命分子，为建立新上海的良好秩序，为保卫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潘汉年比扬帆大六岁，江苏宜兴人，他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担任过党的保卫部门的领导，一九三四年底红军长征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，遵义会议后被党中央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。解放后任上海第一任副市长。因为他们两人都在三十年代的上海做过地下工作，领导过文

艺，新闻界，了解江青在上海那段不可告人的历史，所以遭到了康生、江青的迫害。一九五五年，他们相继被捕，并以“潘、扬反革命集团案”的名目被定罪判刑。潘汉年同志于一九七七年四月病故于湖南沅江茶场。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，恢复党籍，追认他的历史功绩，公开为他恢复名誉。扬帆同志在狱中经受了二十多年的精神折磨，以致右眼萎缩失明，左眼也只剩下0.1的微视力。更可悲的是晚年他得了感应性精神分裂症，连自己的妻儿都不能相认。这些触目惊心、令人愤慨的事实，在张重天同志所写的《共和国第一冤案》中都有朴素的记述。

张重天同志多年从事军事题材创作。三年前，他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疗养时，巧遇扬帆同志和他的夫人李琼同志。凭着作家的敏感，他访问了扬帆和李琼同志。并化了一年多的时间查阅资料，调查访问，写成了《共和国第一冤案》一书，这本书通过丰富的资料写出了解放后的第一冤案——“潘、扬事件”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，表现潘汉年、扬帆同志“蒙冤不说违心言，劫后余生壮志酬”的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，十分感动人心。

一九八〇年四月，扬帆同志平反出狱，宣告无罪，公安部做了平反结论。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五日，公安部专门发了“关于扬帆同志平反的通知”，中共上海市委对扬帆同志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。如今，这位七十七岁的老人，是上海市政协委员。他说：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心扉。”他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。对祖国的四化建设，对改革的美好前景充满了坚定信念。我们深信，在党的“十三大”路线的指引下，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，历史的悲剧决不会重演。

一九八九年二月于北京



杨帆、李琼夫妇和作者

杨帆

李琼

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

(杨帆、李琼亲笔签名)

●苏联巴尔维哈，他和江青不期而遇。一种不祥之兆象藤蔓一样紧紧缠住了他

春天姗姗来迟。

已是阳春四月，在苏联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的海滨旅游胜地——巴尔维哈，晚间的气温还在摄氏零下两度，附近高高的山坡上，尚能看到还未溶化的积雪。但是，四天前，突然刮起一阵暖风，紧接着满天乌云笼罩着，不到午夜，哗哗地下起雨来，温暖的、猛烈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。第四天，雨也停了，风也止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天空晴朗了。这时，人们才感到真正的春天来到了。

春天来到了巴尔维哈。座落在巴尔维哈海滨的巴尔维哈疗养院的人们开始活跃起来。巴尔维哈疗养院也叫苏联部长会议疗养院。从名称上人们知道这是苏联第一流的疗养院。疗养院的住房、伙食，乃至医疗设备、大夫，都是全苏第一流的。来到这里疗养的人，除了苏联部长会议、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和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首脑，便是各国兄弟党的首脑和各国领导人。少数苏联有特殊功勋的人也持疗养证来这里作短期疗

养。得到这种权益的人，在苏联看作是一种殊荣。

在踏青、海滨走动的穿着疗养服的众多的人群中，有一个魁梧的中国人。他高高的个子，红红的脸庞，长得挺结实，戴着一副墨镜。他姓石，叫蕴华，但是三十年代他参加革命后，一直用扬帆、殷扬的名字。现在叫扬帆，是上海市公安局局长。三个多月前，也就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月，他因脑中长瘤，组织上决定他来苏联治疗，先在苏联莫斯科神经外科研究院附属医院手术，摘除了脑中的肿瘤。之后，作为来自中国的尊敬的客人，他又被送来巴尔维哈，享受这种殊荣。

春天的来到，使常久卧床和室内活动的扬帆感到生命的骚动和欢乐。当暖和的太阳照到他的窗台上时，他毅然丢掉拐杖，披上呢制的疗养冬服走出了室外。

温和而又略带潮湿的风，微微地从海面上吹来，扬帆踏着刚刚显出绿色的隔年的草坪，轻轻地走着。他来到一片桦树群边站住了，脱下墨镜，看看这蔚蓝的海、挺拔的桦树杆。是的，他从莫斯科神经外科附属医院刚来这里那阵子，正是阳历二月，严冬封锁了这里的一切。加上他刚动手术，双目的视力差极了，他无法享受这如画的景色，只能听翻译介绍。如今，天也转暖了，视力也有了很大恢复，他应该出来看看，现在他如愿以偿了，脱了墨镜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。

忽然，他的眼前闪过一排小树。

扬帆认识，那是雪球花，那是红醋栗，这只有苏联，或者说列宁格勒海滨才能寻到的特有植物。如今，它们枝芽上已经绽出了花蕊。他欣喜地走近它，伸出手轻轻地抚摸它。这时，他见到一只探险的蜜蜂正绕着新开放的花蕊嗡嗡忙碌着。就象是精灵，见人既不害怕，也不管理人，尽自管自己，从一朵花蕊到另一朵花蕊，穿梭奔忙着嗡嗡欢叫着。

扬帆正看着花蕊出神，耳边却传来一阵轻松的笑声。他忙回头，见是两个女人，一个是他来苏联后常见的白俄罗斯女人，高鼻梁、绿眼睛、金黄色的头发，很象新疆的哈萨克人。她穿着一套淡蓝色的西服，外面披着一件绛红色的大衣，高跟鞋、长统袜，完全是这里人的打扮。她说着流利的中国话，正与旁边的另一个女人在说话。

旁边的另一个女人，却用黑的衣服裹着，黑色的呢大衣、黑色的皮鞋、黑色的袜子，连头上的帽子也是黑的。扬帆正面看时，才注意到，她瘦削，皮肤白净，戴一副金丝眼镜。她正操着一口地道的中国北京话在与金发女郎谈话，声音是那么的熟悉。他想正面看她们，却又感到不甚礼貌。正犹豫，只见两个女人已经直向他走来了。

扬帆礼貌地闪到一边。

奇怪的是：那个用黑色的衣服裹着的女人，突然停住了脚步，侧过头来看了看扬帆。

扬帆这时也想起来了，她不正是十六年前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主演“大雷雨”话剧的蓝苹么？

但是，没等他想完，裹黑色衣服的女人往前走了。

“是她！江青。她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他感到既意外又突然。忽地脑子嗡一下，象是身上通了电一样，顿时浑身热烘烘的，说不清是愁闷、烦恼，他睁大着眼睛，惘然地看着那远去的女人。半晌，才象醒悟似地自语道：“噢，她也在这里疗养。”然后，他踏着蹒跚的步子，一步步地走回住所，踏进了自己的房里。

扬帆看到的，一点也不错。

那一身穿黑、在海滨走过、风韵依然的女人，正是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电影、话剧界的蓝苹，如今毛泽东主席夫人江

青。

江青，原名李云鹤，一九一四年出生在山东省诸城县县城一户姓李的地主家里，母亲是地主的第二位太太，中国人习称小老婆。

李云鹤从小长得眉清目秀，活泼伶俐。她爸爸开了一间木匠铺，成天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回到家里虐待、殴打小老婆。李云鹤的母亲不堪虐待，在一次遭受殴打后，带着李云鹤漏夜偷逃出了李家，来到一户号称诸城第一豪富的张姓地主家当女佣。那年李云鹤才十四岁，她母亲也只四十多岁。

地主张老爷有个儿子，原名张旺，亦叫张宗可，后来化名赵容，已是二十多岁，在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大学读书。那年夏天，他放假回家，无意中发现，新来的女佣有一个俊俏的女儿，高高的个子，细细的腰身，一双“解放脚”（即那时女子缠过的小脚，后来不缠了，俗称“解放脚”），长长的瓜子脸上眉毛弯弯，双眼皮下闪动着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，口鼻端正，不禁令张大少爷倾倒了。

再说，这个李云鹤，自幼常听人们夸赞自己长得漂亮，很是得意。如今见到这位张大少爷仪表堂堂，还是位大学生，也就有了三分好感。

张大少爷发现这个李云鹤不但长得漂亮，还十分聪慧，口齿伶俐，觉得放在乡下读书可惜，第二年便把她带到济南，托人送进山东省实验剧院学戏。

一九二四年，张大少爷易名张耘，离开济南齐鲁大学去当时的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去读书，便与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的李云鹤暂时断了联系。

举目无亲、孤身只影留在济南学戏的李云鹤，张大少爷一走，并不感到寂寞，只是觉得少了一个靠山。这时，巧为钻营

的李云鹤，结识了一个新靠山、贵夫人俞珊。

俞珊是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、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赵太侔的夫人，也是个戏迷和票友。

李云鹤长相不错，学戏后又聪明用功，实习演出时掌声最多，得到了赵太侔夫妇的青睐。特别是俞珊，早已看上了这位十六岁的少女，她不时地把李云鹤叫到她家里说戏教唱，有时也与她谈谈心。

俞珊有个弟弟，叫俞启威，比李云鹤大三岁，在青岛大学读书。那年放假回姊姊家看望，巧遇李云鹤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加上俞珊的从中撮合，不用多久就成情侣。这个俞启威，就是后来的黄敬，他在全中国解放后，曾任天津市长和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。

俞启威虽有个当阔太太的姊姊，自己出身却颇清寒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备受生活的熬煎，他好不容易靠着姊姊、姊夫的资助，在青岛大学读书，便发愤努力，并与思想进步的同学往来，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一九三一年初春，俞启威在姊姊的帮助下，把当年的李云鹤，后来的蓝苹、江青介绍到青岛大学当旁听生。之后，在青岛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工作，一月二十多元。有了固定的收入，她便与俞启威同居了。两年后，即一九三三年，出于地下党的需要，俞启威的介绍，李云鹤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半年后，俞启威被捕，李云鹤害怕极了，便想到离开青岛这块是非之地，找那九年前离开济南去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读书的张耘大少爷。于是凭青岛原先的关系，通过上海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，到了五彩缤纷、无奇不有的上海，暂时安排在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。

可惜，李云鹤打听了半天，张耘少爷已于半年前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去了。

李云鹤先是感到茫然，但是，之后为了迷恋名利和物质上的享受，经人介绍，进入了无名剧社充当演员，而且学时髦，参加上海农工工学团，到工厂教工人读书，为工厂女工服务。怎知好事多磨，是年十月，她在上海沪西小沙渡路为女工教识字课，回来时，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，快到西郊兆丰公园时，她被捕了。

李云鹤被关押在上海公安局的看守所里。她吓坏了，大哭大闹，当然不愿意为“主义”坐牢，更不愿意葬送自己的青春年华，乞求特务宽恕她。

公安局训导股审讯组的特务头子赵耀珊满足了她。但是，李云鹤也满足了特务的要求，不仅填写了自首登记表，而且写下了保证书，悔恨自己“误入歧途”，受了“蒙骗”，今后“反对共产主义，拥护三民主义”、“发誓以后不再加入中国共产党”。

当年的李云鹤、蓝苹，如今的江青，这段混浊而又丑恶的历史，是扬帆无意中得知的。那是十六年前，扬帆继潘汉年之后，在上海搞左联文化工作。当时，为了搞文化救亡工作，见过她，看过她的戏，也了解了她这段肮脏的历史。如今，十六年过去了，显然，她老了，可音容笑貌依然。应该说，长期从事情报、保卫工作的扬帆，对识别各种人，都有一种特殊的本领。他相信自己的眼睛没有看错。当然，他也相信，如果不是大意，尽管只是那回头一瞥的一刹那，她，当年的蓝苹，也会认出他。

是的，江青在海滨对扬帆短短的一瞥，留给扬帆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。回到住所整整两天，他无心看报、听音乐，头脑里反复出现着江青那可怕的黑色的影子。他想极力忘掉它，但是清晰的画面却一次又一次地涌进他的脑海。

正巧，三天后的一个下午。他刚午休起来，值班护士告诉他，有客人找他。他走进会客室，却见蔡畅蔡大姐来看他。

“您好！蔡大姐！”扬帆激动地伸过手去。

蔡大姐蔡畅同志，她是党内几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大姐中的一位。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第一任全国‘妇联’主席，为妇女的解放事业日夜奔忙着。对蔡大姐，扬帆十分熟悉。蔡畅大姐，远在二十年代就跟随她的哥哥蔡和森，从事党的地下活动。三十年代，蔡大姐辅佐他爱人、当时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工作时，扬帆已经认识了蔡大姐。以后，因工作上的关系，他们的来往更密切了。

“我刚来莫斯科。听说您病了，富春同志嘱我来看看您。”蔡畅同志笑着说。

扬帆很感激，说：“谢谢您，也谢谢李富春同志！”

接着，蔡畅同志关切地问起他的病情。扬帆将到达莫斯科做手术以及手术后来巴尔维哈疗养院疗养，病情已有极大好转的情况，详细地向蔡大姐作了汇报，最后说：“恢复很快，我想治完一个疗程，就出院回国了。”

“想家了？”蔡大姐半开玩笑地笑笑说。

扬帆点点头，接口说：“故土难舍。俗话说‘金窝、银窝，不如家里的草窝’。”

蔡大姐也笑了。笑过一阵，她问扬帆道：“江青同志也在这里疗养，知道么？”

扬帆心里一怔，忙回答蔡畅说：“听说。”

可不是，扬帆不仅听说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“看到了”。江青，就是前几日海滨巧遇的那位裹着黑衣服的女人，当年的蓝苹小姐。但扬帆毕竟没有与她说话，没有任何接触和交谈过。加之，心里压着那块石头，就没有正面回答蔡大姐见到或

没有见到。

“走，一起去看看她。”蔡畅见扬帆不答，以为是同意了。其实，她那里知道扬帆的心事。

扬帆为难了，囁囁嚅嚅地说：“我不去了吧。蔡大姐，你们可多谈谈。”

蔡畅站起身来，爽朗地笑了，笑过道：“一个大男同志拖拖拉拉。走，去看看。我也没有多少可说，只是礼节性的拜访。”她看到扬帆没有起来，没有走的意思，便又说：“你们都是中国来疗养的，应该去看看她，这也是礼节。”

“礼节”，扬帆给说服了。他站了起来，跟着蔡畅大姐走出了屋子。

江青的疗养楼是单独的，房屋近山傍水，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。二层小楼除了有卧室，还有单独的餐厅、健身房、看电影跳舞两用的客厅，十分别致，是疗养院的高级疗养区。江青已经不止一次来这里疗养，她几乎是常客。远从一九四九年四月，中共中央从西山搬进京城，江青已对北京古老城市厌倦了。她响往国外，认为前几年在土山沟里‘关’苦了，向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到苏联去检查身体，并把八岁的李讷一块带去，顺便割扁桃腺。于是五月，她就经沈阳到大连，搭飞机到莫斯科，在莫斯科中央一流的医院检查身体后，又送来这里疗养。她在这里踏青、散步、打网球、喝咖啡，过着相等于国家元首优越的生活，这对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醉心于名利与享受的人来说，是十分高兴的。回国后，她又找到机会第二次来了。蔡畅来这里见江青已是第二次了，她熟悉地沿着弯弯曲曲的小道，往江青疗养的别墅走去，扬帆跟着蔡畅大姐走了进去。

这时江青午休没有起床，值班护士请两位客人稍等。

蔡畅大姐与扬帆等了好长一会儿，江青才懒懒散散地从楼

上下来。一边走，一边还问：“谁呀？”当她见到蔡畅大姐时也不敢怠慢，忙说：“您好！大姐！”江青扭妮地走了过来与蔡大姐握手。但是，当她转过身来与扬帆同志照面时，她几乎楞住了。

“江青同志，您好！”扬帆同志主动礼貌地招呼。

江青笑笑，道：“您好！您好！”然后伸出手来与扬帆握手。

蔡大姐问道：“你们认识？”

江青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心直口快的蔡畅大姐往沙发椅上坐下来，一边端起茶杯，一边指指扬帆说：“你们应该认识。扬帆同志三十年代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工作。”

象触了电似地，江青叫了起来：“喔，三十年代你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工作？”

扬帆点了点头。

江青又问道：“那我们应该见过？”

憨厚、正直的扬帆直言道：“对，见过，一起开过会。印象最深的是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。我在那里看过您当时演出的话剧《大雷雨》，您演女主角。以后，我们又在后台交谈过。”

江青不断地点头。是的，这一切她似乎都想起来了。少顷，呷了一口茶，打断道：“您当时用的名字是——”

扬帆道：“当时叫殷扬，殷勤的殷，飞扬的扬。有时也用笔名扬帆，扬长补短的扬，帆船的帆。”

“殷扬、扬帆，殷扬、扬帆！”江青将茶杯往桌上一放，轻声念叨着。现在她一切都想起来了。她尤其想到了埋在心头的那笔老账：“莫非就是这个殷扬，当年在新四军总部用电报

告我的刁状？”于是，她脸色阴冷地道：“以后，你到了新四军军部？”

扬帆还被蒙在鼓里，忙答道：“是的，一九三九年初，新四军皖南军部要求上海地下党动员一批青年去皖南参加新四军，以‘慰问三战区将士演剧团’的名义去云岭。”

蔡畅同志了解扬帆，补充道：“扬帆同志是演剧团临时党支部的支部书记。”

江青点点头，轻声地说了声“喔！”然后又扶了扶金丝眼镜，对扬帆说：“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后来你给新四军政委项英当了秘书，是项英的好帮手！”她话中有话。

扬帆听出弦外有音，但还是没有明白江青问话的真实意图，点点头，说：“对，开始我在军政治部所属文化队任政治指导员，后来调任军政治部秘书。”

江青半阴半阳地：“项英很器重你嘛！”

扬帆这时才听出话中的真意。但他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江青才好。

蔡畅同志也是位聪明人这时才觉察到江青的话中有些味道，忙给尴尬的扬帆打圆场道：“扬帆同志积劳成疾，脑子里长了瘤，这次是来苏联治疗的。”

但是，对扬帆的病情，江青一点也没有兴趣，她烦躁地听蔡大姐讲完扬帆的病情，又问扬帆道：“在新四军你当秘书，用的是笔名扬帆？”

扬帆答道：“那是战争年代的需要，从上海地下党到了部队，将名字改了过来。”

江青点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？用的是什么名字？”

扬帆是个耿直的汉子，他不想在别人面前讲假话，隐瞒自

己的身分，便说：“上海市公安局局长，现在叫扬帆。”他心地坦荡地。

江青接口又说：“喔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，扬帆，三十年代领导上海文化救亡工作的殷扬，新四军时的秘书扬帆。”她唸唸有词，轻轻地说着，仿佛演员在排演场里唸台词。

就这样，结束了他们间微妙的对话。之后，江青与蔡畅之间的寒暄、江青向蔡畅说自己胆囊不好，埋怨疗养院太寂寞等等，扬帆一概也没有听清楚。他的思想凝住了。不，应该说，他的思想没有凝住，而是飞出去了。面对着这位历史复杂、权位显贵的女人，想着，三天前在海滨公园里看到她时，她那仇恨的一瞥，想到刚才一连串微妙的追问，想到那些不阴不阳的言语，想到三十年代的上海，想到新四军在皖南的一些生活片断，他真是有些不寒而慄，心中升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虚惶与不安，以致他走神了，端起茶杯喝茶时，茶水泼到了自己的身上。蔡畅同志谈话结束时，叫他扬帆的名字也没有听见。

走出疗养楼，蔡畅看到扬帆的情绪有些异样，忙问：“老扬，你怎么呢？身体不好？”

扬帆点点头。他怎么向蔡大姐说呢？怎么道出这曲曲折折的历史、这埋藏在心头的隐情？

扬帆辞别了蔡大姐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里。他坐在沙发上，于是，遥远而又清晰的往事，又象电影一样，在他的脑海里升起、升起……